

## 《文心雕龍》紀評的折中思維與接受

廖宏昌\*

### 〔摘要〕

紀昀在清代學術界卓有建樹，除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外，尚有《玉臺新詠》、《玉溪生詩說》、《蘇文忠公詩集》、《瀛奎律髓》及《文心雕龍》諸評點，朱東潤認為「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紀氏者」，誠非虛美。然而大氣魄的批評成就，必然備具深厚根柢的批評目光，方能洞燭錙銖，言之有物。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立論，言屢稱劉勰，推重劉勰，而《文心雕龍》之評點，更是「《文心》研究由一般的注釋考訂到理論分析轉向的標志」，則《文心雕龍》必是其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依據，劉勰的理論思維亦必深植於紀昀文學批評體系之中。細繹劉、紀二氏理論體系建構中之折中思維，有極縝密之傳承關係，因擬以為題，試從：一、痛陳時弊，反思時弊；二、文學演變規律認知與折中思維；三、理論體系的建立與折中思維，三方面論述之。

關鍵詞：《文心雕龍》、通變、折中、劉勰、紀昀

---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紀昀在清代學術界卓有建樹，除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外，尚有《玉臺新詠》、《玉溪生詩說》、《蘇文忠公詩集》、《瀛奎律髓》及《文心雕龍》諸評點，朱東潤認為「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紀氏者」，<sup>1</sup>誠非虛美。然而大氣魄的批評成就，必然備具深厚根柢的批評目光，方能洞燭錙銖，言之有物。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立論，言屢稱劉勰，推重劉勰，<sup>2</sup>而《文心雕龍》之評點，更是「《文心》研究由一般的注釋考訂到理論分析轉向的標志」，<sup>3</sup>則《文心雕龍》必是其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依據，劉勰的理論思維亦必深植於紀昀文學批評體系之中。細繹劉、紀二氏理論體系建構中之折中思維，有極樞密之傳承關係，因擬以為題，試從：一、痛陳時弊，反思時弊；二、文學演變規律認知與折中思維；三、理論體系的建立與折中思維，三方面論述之。

## 一、痛陳時弊，反思時弊

劉勰嘗對當代的文風變革論曰：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評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鞏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奧，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

1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84年2月），頁354。

2 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卷首〈凡例〉即曰：「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儒者說經論史，其理亦然。」（頁45）《文心雕龍》（清黃叔琳注、紀昀評，道光十三年兩廣節署本）。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7月。以下引紀評皆依此本，〈原道〉紀評：自漢以來，論文者罕能及此，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頁21）〈樂府〉紀評：「此乃析出本旨，其意為當時宮體。觀《玉臺新詠》，乃知彥和識高一代。」（頁71）。

3 語見沙先一：〈論紀昀的《文心雕龍》研究〉，《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3期，2002年9月。

始論文。<sup>4</sup>

此蓋亦其《文心雕龍》撰述之一動機也。劉勰針對文風浮詭、藻飾淫麗之弊，故有卷六至卷九「文術」之說；針對文體解散、辭人愛奇之病，故有卷二至卷五「文體」之論。其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系統，就建立在反思當代文風的基礎之上。

魏晉南北朝無論在社會結構或文化思想，皆是變化自覺的時代，對於文學的演變，《隋書·李諤傳》即云：

自魏三祖，更尚文辭，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逐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sup>5</sup>

說明魏晉至於齊梁之文風，其有極大的轉變，大約魏晉「緣情而綺靡」，尚注重創作主體之個性，迄於齊梁，文采是尚，已踰越性情之追求，劉勰「訛濫」之評，蓋有以也。紀昀評點《文心雕龍》，對魏晉南北朝的文壇背景，及劉勰撰文之要旨，亦洞若觀火，從而肯定《文心雕龍》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現實批評意義。即如〈明詩〉云：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sup>6</sup>

紀昀評云：

---

4 劉勰：《文心雕龍》（范文瀾註，香港：商務印書館，1986年7月。以下引《文心雕龍》各篇正文皆依此本），卷10〈序志〉第50，頁726。

5 引見劉勰：《文心雕龍》，卷9〈時序〉第45，〈范註·附錄〉，頁690-691。

6 劉勰：《文心雕龍》，卷2〈明詩〉第6，頁67。

齊梁以後，此風又變，惟以塗飾相尚，側豔相矜，而詩弊極焉。<sup>7</sup>

〈樂府〉紀評：

此乃析出本旨，其意為當時宮體競尚輕豔發也，觀《玉臺新詠》乃知彥和識高一代。<sup>8</sup>

又指出：

「務塞淫濫」四字為一篇之綱領。<sup>9</sup>

於〈詮賦〉，紀昀評云：

篇末側注小賦一邊言之，救俗之意也。<sup>10</sup>

又云：

洞見癥結，針對當時以發藥。<sup>11</sup>

其評〈情采〉亦云：

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齊梁文勝而質亡，故彥和痛陳其弊。<sup>12</sup>

---

7 紀昀評：《文心雕龍》，卷2〈明詩〉第6，頁60-61。

8 紀昀評：《文心雕龍》，卷2〈樂府〉第7，頁71。

9 紀昀評：《文心雕龍》，卷2〈樂府〉第7，頁69。

10 紀昀評：《文心雕龍》，卷2〈詮賦〉第8，頁81。

11 紀昀評：《文心雕龍》，卷2〈詮賦〉第8，頁82。

12 紀昀評：《文心雕龍》，卷7〈情采〉第31，頁277。

紀評揭示齊梁文學之本質，示後人以劉勰痛陳時弊之用心，對《文心雕龍》整體研究之切入點，有其重要的意義。

再如〈原道〉，紀昀評曰：

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sup>13</sup>

其評〈詔策〉曰：

彥和之意，似以魏晉為盛軌，蓋習於當時之所尚，觀自斯以後二語，其旨可知。<sup>14</sup>

則緊貼著「文體解散」、體製放逸不羈而言。循「其旨可知」的語勢，不僅透露出紀昀深知齊梁文風的演變，也傳達了劉勰強調「文體之尊」和力挽文風訛濫的意圖。紀評對後人窺探劉勰「矯訛翻淺，還宗經誥」之基礎思想，實一大助益。

## 二、文學演變規律的認知與折中思維

鑒於齊梁文風的演變，劉勰論文反對片面追求新奇浮豔，〈定勢〉云：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sup>15</sup>

此即針對時人片面追求新奇，適俗成怪者而發，其於〈體性〉，分文章風格為八

13紀昀評：《文心雕龍》，卷1〈原道〉第1，頁21。

14紀昀評：《文心雕龍》，卷4〈詔策〉第19，頁185。

15劉勰：《文心雕龍》，卷6〈定勢〉第30，頁531。

體，有新奇者，曰：「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sup>16</sup>其病同似。至如〈情采〉云：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sup>17</sup>

則又針對時人片面追求淫麗之風而發。指出後人背離《詩三百》為情造文之優良傳統，沿襲楚辭、漢賦的侈豔文風，為文造情，以致於淫麗煩爛，其於〈宗經〉歎云：「楚豔漢侈，流弊不還」，<sup>18</sup>即就楚辭、漢賦對後世文風負面的影響而言。

面對流弊日滋，浮靡成風的文壇，劉勰欲矯時弊，於是痛下針砭，表現出極具鮮明的「宗經」立場，認為「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而經典源出於聖人，且「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sup>19</sup>雖則如是，但劉勰置身於文學自覺的大時代中，自然也感受到文學發展演變的實際與成果，因此，在《文心雕龍》卷一即有〈辨騷〉之設，稱《離騷》「奇文鬱起」、「文辭麗雅」，甚至「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並進而認為為文應「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取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sup>20</sup>也即是主張酌取楚騷之奇辭華采，臻極所謂「執正馭奇」<sup>21</sup>的創作原則。

紀昀評〈辨騷〉乃曰：

16劉勰：《文心雕龍》，卷6〈體性〉第27，頁505。

17劉勰：《文心雕龍》，卷7〈情采〉第31，頁537。

18劉勰：《文心雕龍》，卷1〈宗經〉第3，頁23。

19劉勰：《文心雕龍》，卷1〈徵聖〉第2，頁16。

20劉勰：《文心雕龍》，卷1〈辨騷〉第5，頁45-48。

21劉勰：《文心雕龍》，卷6〈定勢〉第30，頁531。

詞賦之源出於騷，浮豔之根亦濫觴於騷，辨字極為分明。<sup>22</sup>

則數語道盡《離騷》在文學史上之雙重性，從文學發展演變之角度言，《離騷》是詞賦之本原，是繼《詩三百》之後，讓文苑邁向多元化的關鍵；就文學審美之角度言，《離騷》則是文風轉趨侈豔的關鍵。無論在文學形象、詩體結構或創作手法，對後世皆有正、負面之影響。正與劉勰之論，相互發明，而其服膺劉勰「執正馭奇」之創作原則，也完全流露於字裡行間。

劉勰「執正馭奇」的創作原則，充分展現其對文學本原及演變發展總體性的把握和認識，也充分顯示其不擯古、不競今的論文態度。而對文風的演變及矯正時弊的思維，其〈通變〉則有更集中的論述：

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末氣衰也。<sup>23</sup>

又曰：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蓀，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蓀；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彙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sup>24</sup>

其對質文、雅俗之斟酌彙括，既強調宗經，又重視後代的華辭奇采，也即是上述「執正馭奇」的文學創作原則，其立論實際上是一種揚長去短的「折中」思維，〈序志〉所云「擘肌分理，唯務折衷」，<sup>25</sup>即此之謂。

22紀昀評：《文心雕龍》，卷1〈辨騷〉第5，頁47。

23劉勰：《文心雕龍》，卷6〈通變〉第29，頁520。

24劉勰：《文心雕龍》，卷6〈通變〉第29，頁520。

25劉勰：《文心雕龍》，卷10〈序志〉第50，頁727。

紀昀評點《文心雕龍》，在評點過程中除了融會劉勰理論思維加以剖析外，甚而將其理論加以深化，轉換成個人的理論思維模式，且觀〈通變〉紀評曰：

齊梁間風氣綺靡，轉相神聖，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彥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於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故挽其返而求之古。蓋當代之新聲，既非濫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復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sup>26</sup>

即將劉勰根植於齊梁浮靡文風的通變主張，援竟陵、公安以明徵之，事實上也就自然地抽換成個人將學理論系統建立的模式。試就三方面以明紀昀對劉勰理論思維的接受。

### (一) 詩學發展動因的認知

紀昀嘗論及詩歌變化與發展規律的相關問題，以為：

三古以來，文章日變，其間有氣運焉，有風尚焉。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為《尚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為《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至風尚所趨，則人之心為之矣。其間異同得失，縷數難窮，大抵趨風尚者三途：一厭故喜新，一巧投時好，一循聲附和，隨波而浮沈。變風尚者三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鬥巧爭長，其一則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頹敝之習，亦不欲黨同伐異，啟門戶之爭，孑然獨立，自為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又於風尚之外，自為一途焉。<sup>27</sup>

其所謂「氣運」及「風尚」即是古來文章日變之兩大要件。「氣運」不隨個人意志改變而改變，重在外在之時代環境。「風尚」乃「人之心為之」，則是個人的審美趨尚；蓋無論語言、技巧、風格、結構，皆可能因個人之「趨風尚」或「變風

<sup>26</sup>紀昀評：《文心雕龍》，卷6〈通變〉第29，頁265。

<sup>27</sup>紀昀〈愛鼎堂遺集序〉，《紀文達公遺集》（嘉慶十七年刊本，台北：國立中央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9。



尚」，逐漸蔚為流行風潮，甚而形成詩歌自身的演變規律。因此，如果就詩歌發展的動因，也即是對「變」的認識，檢閱吾國傳統詩學，不外有自動論和被動論二者。被動論強調外在環境之影響，自動論則強調詩歌自身的發展流變。依此而言，「氣運」屬於被動論，「風尚」則是自動論。紀昀論詩文日變的動因，兼顧自動與被動，展現了詩學史觀宏通的視野，並進而直抉獨立於「風尚」外，卓然成家之理想。

對於不隨個人意志改變的被動論，及審美趨尚形成其自身演變規律之自動論，紀昀更進而論曰：

陽和陰慘。四序潛移，時鳥候蟲，聲隨以變。詩隨運會，亦莫知其然而然。論詩者不逆挽其弊則不足以止其衰，不節取其長則不足以盡其變。詩至五代駸駸乎入詞曲矣。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由是以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而《三百》以下無詩矣。豈通論哉？就短取長而纖靡鄙野之習則去太去甚，庶幾酌中之制耳。<sup>28</sup>

劉勰嘗謂：「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sup>29</sup>又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sup>30</sup>自然與詩文創作之關係，不待言說可知其深矣，因此，〈原道〉即明白指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sup>31</sup>闡述了詩文產生的客觀必然性。紀昀予此論高度評價，認為：「純任自然，彥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論。」<sup>32</sup>又曰：「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sup>33</sup>指出了劉勰標舉「自然」以矯正齊梁徒尚形式、淫麗輕豔文風的另一途徑。

紀昀推原陰陽四序，視劉勰之論，如出一轍，最能見自然對詩文之影響。除

28紀昀〈書韓致堯翰林集後二則〉，《紀文達公遺集》，卷11。

29劉勰：《文心雕龍》，卷2〈明詩〉第6，頁65。

30劉勰：《文心雕龍》，卷10〈物色〉第46，頁693。

31劉勰：《文心雕龍》，卷1〈原道〉第1，頁1。

32紀昀評：《文心雕龍》，卷8〈隱秀〉第40，頁334。

33紀昀評：《文心雕龍》，卷1〈原道〉第1，頁22。

此，紀昀也注意到詩歌自身的發展規律，以為：

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者也，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sup>34</sup>

「文章格律」即著重包括詩歌在內之文章的演變規律而立說。前述之「詩隨運會」，「運會」者當兼括其謂「氣運」及詩歌自身演變之規律而言，一如葉燮即有「世運」、「文運」之語，<sup>35</sup>世運較近於「氣運」，文運即紀昀所謂「文章氣格與世俱變」者，當近乎詩歌自身演變之規律。綜述「運會」，即以統括自動論與被動論二者。

## （二）詩歌演變規律之探討及其針對性

紀昀不僅論述了詩歌變化的動因，還嘗就唐末至清初詩歌流派演變之軌跡，<sup>36</sup>分析詩歌變化的規律及形式，歸結所謂「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的

34紀昀：〈治亭詩介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

35葉燮《百家唐詩序》：「有世運，有文運。世運有治亂，文運有盛衰，二者各自為遷流。然世之治亂，雜出遞見，久速無一定之統。孟子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其遠近不必同，前後不必異也。若夫文之為運，與世運異軌而自為途。」見《已畦文集》（民初夢篆樓刊印國全書本，台北：國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8。

36紀昀〈治亭詩介序〉曰：「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其弊也靡。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黃三變而恣逸，其弊也肆。范、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襲。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至江湖末派，流為鄙野而弊極焉。元人變為幽豔，昌穀、飛卿遂為一代之圭臬，詩如詞矣。鐵崖矯枉過直，變為奇詭，無復中聲。明林子羽輩倡唐音，高青丘輩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三楊以後，臺閣體興，沿及正、嘉，善學者為李茶陵，不善學者遂千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為復古之說，文必宗秦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蹕厲縱橫，鏗鏘震耀，風氣為之一變，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於後七子，剽襲摹擬，漸成窠臼。其間橫軼而出者，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雲間變以繁縟，如涂涂附，無以相勝也。國初變而學北宋，漸趨板實，故漁洋以清空縹緲之音，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

變弊之道，其由變而弊，再由弊至變之變弊循環，紀昀又簡約地概括為「相激相救」理論模式，自是其創見。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變弊之道要在「逆挽其弊以止其衰」、「節取其長以盡其變」，此即謂其相激相救的理論模式，就在循環之中挽弊取長，節節上升。而此論亦遠邁袁宏道「法因於弊而成於過」<sup>37</sup>的直線進化方式，與葉燮「衰旺相循」而又「節節相生」<sup>38</sup>的「螺旋式上升」理論模式接軌，陳伯海先生認為：「就其立論高度而言，比之二十世紀俄國形式學派倡揚的『文學形式變革的辯證法』，即『陌生化』與『自動化』相推移的理論，也並不遜色。」<sup>39</sup>持論合宜中肯。

紀昀對詩歌螺旋上升理論模式的認識，在當時是有其針對性意義的。先就詩學發展的內部關係言，其時有「趨風尚」及「變風尚」二者。紀昀對趨風尚者，無慮「厭故喜新」、「巧投時好」或「循聲附和」，冷筆一句「隨波而浮沈」，極其不屑；而對變風尚者，於「乘將變之勢，鬥巧爭長」及「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二途，雖不置可否，但他明顯重在「於風尚之外自為一途」之獨立成家，讚許其「不沿頹敝之習，亦不黨同伐異，啟門戶之爭」，因此對變風尚者其實是同表不滿的。紀昀重變，又何以對變風尚者有所苛責？其原因要在鬥巧爭長者如「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唯其「求新於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一味在俗尚之中求新求變，因而流於師心自用，冷峭纖巧，無以相勝。至如「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者，其謂「鐵崖矯枉過直，變為奇詭，無復

---

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趙秋谷掇擊百端，漁洋不怒，吳修齡目以清秀李于麟，則銜之終身，以一言中其隱微也。故七子之詩，雖不免附聲，而終為正規，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惟襲其面貌，學步邯鄲，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見《紀文達公遺集》，卷9。

37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袁宏道集箋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月），卷18。

38葉燮云：「自《三百篇》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時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謂也。」見葉燮《原詩》（《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卷1內篇上。

39陳伯海：《中國文學史之宏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2月），頁169。

中聲。明林子羽輩倡唐音，高青丘輩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sup>40</sup>因其「反正」，實較為紀昀所稱許，唯紀昀亦嘗「問青丘之體裁如何，則莫能舉也」，<sup>41</sup>鐵崖更是「怪怪奇奇，不能方物」，<sup>42</sup>同然嗤之以鼻。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評《欽定四書文》也云：

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為極盛。隆、萬以機法為貴，漸趨佻巧，至於啟、禎，警僻奇杰之氣日盛，而駁雜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於其間。於是啟橫議之風，長傾波之習，文體戾而士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sup>43</sup>

明代文風轉變之大略，蓋如是也，而所謂「文體戾而士習彌壞」，則同似劉綬〈序志〉：「文體解散，辭人愛奇」之云，唯其批評的對象仍是復古、新變之偏勝思潮。何以紀昀援明代偏勝思潮而有所批評？究其原由，實不外綜結經驗，防弊興利，試圖在前人基礎之上建立一己之詩學體系。

紀昀重變，要在獨立成家，唯其既不喜公安、竟陵之新變，又對青丘古調頗有微詞，其欲如何面對明代文壇之復古和新變？其實就在「學古而變出」，如其評李商隱〈送王十三校書分司〉即云：

神奇腐臭，轉易何常，故變而出之一言，為善學古人之金針也。<sup>44</sup>

40紀昀：〈冶亭詩介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參閱本文註36引。

41紀昀：〈鶴街詩稿序〉：「自漢魏以至今日，其源流正變、勝負得失，雖相競者非一日，而撮其大概，不過擬議、變化之兩途。從擬議之說，最著者無過青丘，仿漢魏似漢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問青丘之體裁如何，則莫能舉也。從變化之說，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見《紀文達公遺集》，卷9。

42紀昀：〈鶴街詩稿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參閱本文註41引。

4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欽定四書文》，卷190 集部43 總集類5，頁5202。

44紀昀：《玉溪生詩說》（《槐廬叢書》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月），卷下。

朱鶴齡也嘗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sup>45</sup>即得紀昀之稱許，紀昀並附和之曰：

變出之三字，為千古揭出正法眼藏，知李之所以學杜，之所以學李矣。若擗捨字句，株守格律，皆屬淺嘗。至於拾一二尖薄語以自快，則下劣詩魔，不可藥救矣。<sup>46</sup>

可見其重變，更重在「學古而變出」，一味復古或新變，皆非成家之正途。由此更可以深抉紀昀評《文心雕龍》〈通變〉篇之用心。

唯紀昀發「復古而名以通變」之宏論後，包括黃侃、范文瀾、朱自清諸儒及近代學者多人，<sup>47</sup>都曾對劉勰或紀昀之說有所闡述或批評。其中范文瀾指出「通變之術，要在『資故實，酌新聲』兩語，缺一則疏矣」；<sup>48</sup>朱自清指出劉氏以復古為通變，「近於循環論」。<sup>49</sup>蔡鍾翔更進而指出紀昀領悟劉勰理論內涵的事實，認為「通變的通是屬於『變』的範疇，不是屬於『常』的範疇」，說明了文學「螺旋形的上升」之發展走向。<sup>50</sup>至如王鎮遠有云：

《文心雕龍》所說的「通變」是直接受了《易傳》中的「通變」思想的影響。《易·繫辭》說：「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說：「變通莫大乎四時。」就是說萬事萬物只有變通才能永久，而變化的規律猶如四時的嬗遞，循環無窮。劉勰以復古為「通變」，正體現了《易傳》循環發展的思想，但劉勰在提出「矯訛翻淺，還宗經誥」的復古理論的同時，還強調了「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隲括乎雅俗之際」，「數必酌於新聲」可見他的「通

45朱鶴齡：〈箋註李義山詩集序〉，《玉溪生詩說》，卷首。

46朱鶴齡：〈箋註李義山詩集序〉，《玉溪生詩說》，卷首夾註。

47參閱高文強：〈〈通變〉辨義〉，《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第四輯，頁143至154。

48劉勰：《文心雕龍》，卷6，〈通變〉第29，註3。

49朱自清：《詩言志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頁166。

50蔡鍾翔：〈釋〈通變〉〉，《文心雕龍研究》，第四輯，頁140。

變」並不是單純循環式的復古，而是參以新變內容的復古。<sup>51</sup>

此論堪稱全面，不僅說明了劉綬對「通變」的用心，也似乎更能藉以詮釋紀昀「復古而名以通變」的實質內涵。質言之，劉、紀二人皆是用一種「折中」的思維來把握文學發展之方向。

次就詩學發展的外部關係言，紀昀在「文章格律與世俱變」的基本態度上，針對明代復古思潮而發，反對「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如云：

詩日變而日新，……至嘉隆七子，變無可變，於是轉而言復古。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然摹擬形似，可以駭俗目，而不可以炫真識。<sup>52</sup>

又云：

三楊以後，臺閣體興，沿及正、嘉，善學者為李茶陵，不善學者遂千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為復古之說，文必宗秦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踔厲縱橫，鏗鏘震耀，風氣為之一變，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於後七子，剽襲模擬，漸成窠臼。<sup>53</sup>

謂「駭俗目」、「成窠臼」，主要皆是對其專主一格、模擬形式而論，因此，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曾對李攀龍編纂之《古今詩刪》評曰：

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後書之說，前後七子牽以此論相尚。攀龍是選，猶是志也。……然則文章派別，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為程，未容以時代為

51王鎮遠：〈紀昀文學思想初探〉，《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第11輯，頁281。

52紀昀：〈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

53紀昀：〈冶亭詩介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參閱本文註36引。

限。……厥後摹擬剽竊，流弊萬端，遂與公安、竟陵同受後人之詬厲。<sup>54</sup>

其論詩歌的歷史演變和發展規則，力主「但可以工拙為程，未容以時代為限」，肯定一代有一代之詩，實為卓識之見。紀昀且嘗論曰：

同一書也，而晉法與唐法分；同一畫也，而南宋與北宋分，其源一而流別也。流別既分，則一派中自有一派之詣極，不相攝亦不相勝也。惟詩亦然，兩漢之詩緣事抒情而已，至魏而宴游之篇作，至晉、宋而游覽之什勝，故彥和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也，然其時門戶未分。但一時自為一風氣，一人自出一機軸耳。<sup>55</sup>

其以書、畫流派發展之自有其造詣，說明歷代詩歌自有其時代風氣，各流派亦有其特殊趨尚，作家更都具備其獨特的風格。紀昀「不容以時代為限」、「不相攝亦不相勝」、「一時自為一風氣，一人自出一機軸」之說，即從理論的高度打破了七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之迷思，也為詩學本體的建立，提供可長可久的探索管道，而徵引劉勰之言說，更足見聲息相通之接受。

### 三、理論體系的建立與折中思維

劉勰除了論述文學演變規律採用折中思維外，其在分析文學現象的許多重要的範疇，也都是運用折中思維而完成的。近來專論《文心雕龍》「折衷」之文，以周勛初〈劉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說述評〉及劉文忠〈劉勰美學思想體系的特色——「擘肌分理，唯務折衷」〉二文最為全面。周文以為劉勰提出一系列的概念中，「情采」、「通變」這兩大範疇最為重要，前者把文學中的許多問題作橫向的研究，後者將許多問題作縱向的研究，而〈情采〉和〈通變〉中運用的方法，就是「折衷」。<sup>56</sup>劉文則在李澤厚、劉綱紀主編的《中國美學史》的基

5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古今詩刪》，卷189 集部42 總集類4，頁5170。

55 紀昀：〈田侯松巖詩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

56 周勳初：〈劉勰的主要研究方法〉，《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

礎上，詳加考察「折衷」在《文心雕龍》全書中的運用，並進而用以探討其美學思想的特色，把折衷從方法論上升到美學思想的核心。<sup>57</sup>二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激賞，今則順其思考模式，以明紀昀建立其詩學體系的折中思維，用接受的理論觀念，從另一側面證成劉勰的理論系統。

清代詩學與明代詩學的發展息息相關，亦可直謂：清代詩學是明代詩學的反撥，也是立足於明代詩學偏勝對立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清代詩論家之立論，蓋無一人不對明代偏勝對立之詩學進行反思，並以此為基石，建立其一家之言者。紀昀則將古今詩學之源流正變，概括為「擬議、變化之兩途」，<sup>58</sup>並援明代七子派和公安、竟陵派對立之兩極附會之，認為：

王、李之派有擬議而無變化，故塵飯土羹；三袁、鍾譚之派有變化而無擬議，故徇規破矩。<sup>59</sup>

七子派塵飯土羹，不具面目，公安、竟陵派徇規破矩，怪怪奇奇，<sup>60</sup>蓋亦各具其弊，因此，他對明代詩學進行反思，接續言曰：

蓋必心靈自運，而後能不立一法，不離一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61

主張「心靈自運」、「不主一法，不離一法」，即在擬議之中有其變化，變化之中不失其擬議；亦即是在變化之中不失其正，而在擬議之中有其心靈自運。《四庫

月)第11輯,頁1~29。

57劉文忠：〈劉勰美學思想體系的特色——「擊肌分理，唯務折衷」〉，《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輯，頁114~131。

58紀昀：〈鶴街詩稿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參閱本文註41。

59紀昀：〈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

60紀昀：〈鶴街詩稿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參閱本文註41。

61紀昀：〈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紀文達公遺集》，卷9。



全書總目提要》紀昀嘗云：「巧在規矩之外，而亦不能不出乎規矩之中」，<sup>62</sup>即此之謂。由此益可看出其在復古與新變對立中採行折中之立場，唯其立場堅實，故其思維模式即嘗立題於會試策問，如云：

北地、信陽，以模擬漢、唐，流為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徇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葦甲新意，流為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sup>63</sup>

援明代對立二極之詩學立題，並以「酌其中」設問，真可見其詩學理論系統之建立，與明代詩學之反思是息息相關的，而「折中」更是其理論系統建立之主要方法之一，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時人論著，即多涉二極詩學反思之語，如評李鄴嗣《杲堂文鈔》云：「宗羲《序》稱其皆胸中流出，無比擬皮毛之習。蓋破除王、李、鍾、譚之窠臼，而毅然自為者也。」<sup>64</sup>評董聞京《復園文集》云：「持論甚高，然核其所作，不能出公安、竟陵門戶也。」<sup>65</sup>也嘗用「擬議」、「變化」指陳歷代詩文，如評明王穉《青城山人集》即云：「今觀其詩，音節色澤，皆合古格，誠有擬議而不能變化者。然當元季詩格靡麗之餘，能毅然以六代、三唐為楷模，亦卓然特立之士，又不得以王、李流弊預繩明初人矣。」<sup>66</sup>評明吳桂芳《師暇哀言》云：「其文……猶沿臺閣舊體，詩力摹唐調，亦頗宏敞，而有學宋太甚者。……非謂擬議變化之道也。」<sup>67</sup>諸如此類的評述，正可思見紀昀折中思維。

唯折中思維重在揚長去短，如何揚長去短以建立跨越時空之詩學本體，則端視詩論家卓越的識見，即如「因時而變」者，其實也是明公安派針砭擬古思潮之利器，袁宏道即嘗論曰：

6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二馮評點才調集》，卷 191 集部 44 總集類存目 1，頁 5220。

63 紀昀：〈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紀文達公遺集》，卷 12。

6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杲堂文鈔》，卷 182 集部 35 別集類存目 9，頁 4963-4964。

65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復園文集》，卷 183 集部 36 別集類存目 10，頁 4937。

6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青城山人集》，卷 170 集部 23 別集類存目 23，頁 4421。

67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師暇哀言》，卷 177 集部 30 別集類存目 4，頁 4763。

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sup>68</sup>

又云：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唯識時之士，為能隄其隕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sup>69</sup>

其認為變是詩文發展的規律，時代不同，體制風格自異，也同是各時代的文化藝術，故未足以區分高下優劣。唯其因襲前人，缺乏時代語言和獨特風貌，方是卑微而不合時宜。紀昀論時雖較側重在「風氣」之變，但二人精神理念極為契合。因之，對「因時而變」的詩文發展規律，紀昀與公安立論可謂一致，但對於公安之纖巧俗尚卻又批判有加；其對擬古思潮有「窠臼」之譏，但卻也有復古通變之說。如何針對明代偏勝詩學之弊，揚長去短，即成為明末清初以來諸多詩學理論家的共同話題，折中二端的思維，成為諸多詩論家建立系統理論的基石和趨尚。紀昀重變，其系統理論的建立，也就採行「酌中」的思維方法。

即此而論，折中思維並非專利於紀昀而獨用之，乃時代思維之共同趨尚，<sup>70</sup>紀昀立身於乾嘉，其對清初詩論家折中明代詩學而成之理論，再予折中之現象，即頗令人注目，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諸詩論內容，大可視為乾嘉詩學之共識，如二馮評點《才調集》評曰：

國朝馮舒、馮班所評點，……凡所持論，具有淵源，非明代公安、竟陵諸

68袁宏道〈序小修詩〉，《袁宏道集箋校》，卷4。

69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袁宏道集箋校》，卷18。

70參閱拙著：〈清代詩學史觀的認知取向與折中模式〉，《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出版，2003年11月），頁37-52。

家所可比擬。故趙執信祖述其說。然韋穀之選是集，其途頗寬，原不專主晚唐。故上自李白、王維，以至元、白長慶之體，無不具錄。二馮乃以國初風氣矯太倉、歷城之習，競尚宋詩，遂借以排斥江西，尊崇昆體。黃、陳、溫、李，斷斷為門戶之爭。不知學江西者其弊易流於粗獷，學昆體者其弊亦易流於纖穠。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也。王士禛謂趙執信崇信是書，鑄金呼佛，殊不可解。<sup>71</sup>

概括清初為矯明代擬古思潮，遂有宗宋、宗晚唐之詩派，唯宗宋者，以理、文為詩，以議論、學問為詩，獨缺比興而流於粗獷；宗晚唐者，崇尚文采，比物連類，著重比興而流於纖穠。皆顧此失彼，偏照偶隙，未得詩學之本體，因此，對清初錢謙益、二馮、王士禛、趙執信等詩學主張，以「除一弊而生一弊」兼論之。再如評《御選唐宋詩醇》曰：

蓋明詩摹擬之弊，極於太倉、歷城；纖佻之弊，極於公安、竟陵。物窮則變，故國初多以宋詩為宗。宋詩又弊，士禛乃持嚴羽餘論，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其推為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於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群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別為山水清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為鈍根。士禛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論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謂歟？<sup>72</sup>

則頗有調和宋詩派（錢謙益）、王士禛（唐詩派），二者之「各倚一偏」，以為調和之道，其唯儒家詩教，則頗似劉勰「宗經」之論。至如《唐賢三昧集》之評曰：

詩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

7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二馮評點才調集》，卷 191 集部 44 總集類存目 1，頁 5220。

7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御選唐宋詩醇》，卷 190 集部 43 總集類 5，頁 5200。

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說，獨立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其後風流相尚，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爭。所作《談龍錄》，排詆是書，不遺餘力。其論雖非無見，然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sup>73</sup>

其謂「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正是折中思維揚長去短之謂，也是劉勰「擘肌分理，唯務折衷」之最佳詮釋。

#### 四、結語

紀昀評點《文心雕龍》對近代「龍學」之研究與發展極具影響力，吾師王更生教授即嘗指出：

《文心雕龍》之所以引起後世學術界的注意，正得力於清儒黃叔琳，紀昀注疏、評薦之功。<sup>74</sup>

黃、紀並稱，而紀評以黃注為底本，則更有後出轉精之勢，近人撰論不乏其篇，如溫光華《文心雕龍黃注紀評研究》、汪春泓〈關於紀昀的《文心雕龍》批評及其文學思想之研究〉、沙先一〈論紀昀的《文心雕龍》研究〉，<sup>75</sup>皆能張篁紀昀《文心雕龍》研究之幽邃，展卷評覽，獲益實多，乃就劉、紀二人文學體系之理論思維模式的建立加以比較詮釋，並著重在紀昀對劉勰思維模式接受之探討，期能擴大《文心雕龍》研究的討論空間。

7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唐賢三昧集》，卷 190 集部 43 總集類 5，頁 5205。

74 王師更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秘寶《文心雕龍》》（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5 年 7 月），頁 29。

75 溫光華：《文心雕龍黃注紀評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王師更生指導，1997 年 6 月）。汪春泓：〈關於紀昀的《文心雕龍》批評極其文學思想之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5 期，頁 75-84。沙先一：〈論紀昀的《文心雕龍》研究〉，見同註 3。

援此一角度切入作為研究主題，是有其合理性及意義可言的。首先，是紀昀之相關評論，言屢稱劉勰，其心嚮往之情，溢於言表；次則其手批《文心雕龍》，對後人研究此書之疑竇多所啟發，則紀昀對劉勰理論思維模式之接受是可成立的，而且有其重要的意義存焉。即如「通變」之立論，後人對劉勰、紀昀皆有多方面的評論，或褒或貶，莫衷一是，而本文則重在取徑紀昀的理論體系，再回溯返證劉勰的通變觀，則一切爭議，或可尋此而得一論述之佐證。

# The Compromised Thinking and Acceptance in the Ji's Comments of *Wen-Xin-Diao-Long*

Liao Hung-chang\*

(Abstract)

Ji Yun (紀昀) was very outstanding and contributed to the academics in Qing Dynasty. Besides editing *the Summary of Si-Ku-Quan-Shu* (《四庫全書總目題要》), he also posed a lot of comments in *Yu-Tai-Xin-Yong* (《玉臺新詠》), *Poems of Wang Xi-sheng* (《王溪生詩說》), *Poems of Su Wen-zhong-gong* (《蘇文史公詩集》), *Ying-Qui-Lü-Sui* (《瀛奎律髓》) and *Wen-Xin-Diao-Long* (《文心雕龍》). Zhu Dong-run (朱東潤) thought that in ancient times critics all were devoted to criticizing, and no one could compete with Ji Yun. The comments were sincere but neither superficial nor sound at all. Nevertheless, the achievement of daring to criticizing is certainly with the profound vision of criticism so that all details could be perceived and all comments made sense. Observing 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Summary of Si-Ku-Quan-Shu*, it kept complimenting on Liu Xie (劉勰) and held him in high esteem, but the viewpoint of criticism in *Wen-Xin-Diao-Long* is even the benchmark of the researches shifting from the general comment and investigation to the theoretical analyses in *Wen-Xin*. Moreover, *Wen-Xin-Diao-Long* was definitely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engaging in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Liu Xie was also profoundly dwelt in the system of Ji Yun's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re w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handing down from deducing the compromised thinking of both Liu's and J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s. For this reason, the topic was drafted and intended to discuss it by three aspects: (1) the strictly criticism and simultaneous reflection on the fraudulent practices at that time, (2) the rule recognition of literature evolution and the compromised thinking and (3)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oretical systems and the compromised thinking.

**Keywords:** *Wen-Xin-Diao-Long*, flexibility, compromise, Liu Xie, Ji Yu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